



社会史丛书

# 《大公报》新论

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

## 大公报

Ta-Kung-Pao  
(L'Impartial)  
FRENCH  
CHINESE  
ENGLISH

號萬一

閱訂接直迎

本報地址：天津法租界二十一號路  
電話：二一〇〇  
廣告部：二一〇〇  
發行部：二一〇〇  
印刷部：二一〇〇  
零售每份：二角  
本報代售處：天津各大書局

本報一萬號紀念辭

本報創辦於光緒二十五年正月十一日。即一千九百零九年。其時中國之報業。雖已有年。然其於社會之影響。則尚未能普及。本報之出世。實為中國報業之先聲。其時中國之報業。雖已有年。然其於社會之影響。則尚未能普及。本報之出世。實為中國報業之先聲。其時中國之報業。雖已有年。然其於社會之影響。則尚未能普及。本報之出世。實為中國報業之先聲。

天津人民出版社

贾晓慧 著

# 《大公报》新论

香港回归与香港《大公报》——兼论香港报业的发展

大公报

香港回归与香港《大公报》——兼论香港报业的发展



三联书店

ISBN 7-309-04719-9

定价：15.00元

# 《大公报》新论

——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

贾晓慧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贾晓慧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ISBN 7-201-04047-2

I. 大… II. 贾… III. 大公报—影响—社会舆论—中国—现代 IV. G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6574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邮购部电话:27314360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mailto: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2002年4月第1版 2002年4月第1次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1插页

字数:210千字 印数:1—2,000

定价:20.00元

# 序

魏宏运

《大公报》庆贺创刊 100 周年之际，贾晓慧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恰在此时出版，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巧合。

《大公报》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私营报纸，曾获美国最负盛名的新闻学府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荣誉奖章。《大公报》于 1902 年 6 月 17 日创刊于天津。首创者为英敛之，继由王郅隆接办，1926 年 9 月由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合作以“新记”名义接办。《大公报》以“忘我之为大”的“大”字，和“无私之为公”的“公”字作为报名，自出版起，即负敢言之名，指摘权贵，讥评地方时弊。1926 年确定社训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力图办成“文人论政”的报纸。我读《大公报》是从 20 世纪 30 年代末在西安读中学时开始的，很喜欢该报的社评、社论，觉得简短有力，读来满有趣味。不管观点正确与否，在当时都很有影响。而从历史的角度看，昨日的新闻就是今日的历史，报刊是历史学者研究当时社会的依据。我常要求我的学生们翻看《大公报》，或求知识，或找资料，当会获益匪浅。贾晓慧就是其中的一位。

贾晓慧副教授在天津大学执教多年，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是学校的骨干教师。年过四十攻读博士，颇具勇气和毅力。在南开四年，无论为人、读书、做学问，都踏实、勤奋、兢兢业业，对待学术问题，不含糊，敢于怀疑，勇于求真。她在翻阅《大公报》的时候，发现那一篇篇切中时弊的热辣社评，呼唤改革、建设的激扬文字，无不洋溢出报人及作者身上传承性的士大夫式的社会责任感和经西方思想洗礼后的民主、革新精神。她觉得对《大公

报》的历史评价不能简单地定义为“党派决定论”的“小骂大帮忙”，而且学术界对在中国这段历史中是否有“文人论政”的机会，能否成为“文人论政”的报纸，一直争议不断。应该如何认识，她赞同陈寅恪先生的“境界”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带着这些问题，她明确了研究对象，开始搜集、整理资料。一头扎进故纸堆，逐字逐页逐行翻阅了1931~1938年的《大公报》，积累了丰富的珍贵资料。这种研究方法，使她的论文内容翔实，论证充分，提出了许多新意，令人耳目一新。论文答辩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主编曾业英研究员前来主持，颇为赞赏其文，立即决定取其部分，刊发于《近代史研究》，受到学界的瞩目。

贾晓慧的这本《〈大公报〉新论》与以往的研究相比，特色在于不是从政治态度方面探讨，也不是放在为某个党派服务的狭隘的观念中，而是放在国人为现代化奋斗的历史主题中去研究，不囿旧说，探讨《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具有较大的开拓和创新意义。

作者选择的时间是《大公报》在天津的这一时期，即1931年9月18日后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地制造冲突，肢解中国，华北处于危机之中。南京政府则集中兵力来消灭红军，内忧外患，国无宁日。在民族危机面前，《大公报》一再喊出抗日的正义呼声，把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作为救国救民的手段，提出要进行现代化建设，还提出了开发西部的主张。现代化应以经济的发展为主体，作者以历史的眼光，描绘了当时的经济状况。在研究中，作者严格地从历史实际出发，从第一手资料着手，将30年代《大公报》的现代化主张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及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与现实处境紧

密结合起来。寻求各种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对该报的现代化主张、舆论特色着重以笔墨。

关于《大公报》与国民党的关系,是人们常常提到的问题,作者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她认为不能简单地以“小骂大帮忙”来论断。《大公报》有自己的独立性,对国民党有支持,也有批评,代表了知识界和工商界的愿望与主张,进行了合乎逻辑的阐述。我想,这总是一家之言吧!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遗产之一,《大公报》提供给人们思考、研究的课题是很多很多的,贾晓慧博士只是研究了一个重要的侧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界对《大公报》的研究必然更为广泛和深入,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做出了好的开端。学问的研究,应该有这种精神,我相信并祝愿本书作者在这个领域中会有更多的精品问世。

学海无涯,应与时俱进。是为序。

2002年元月18日于南开大学北村铍斋

## 摘 要

20世纪30年代的《大公报》，被认为是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前人对它的研究多从政治态度论说，本文研究是把它放在国人为现代化奋斗的历史主题中。

在中国处于内外危机的国难时期，《大公报》认为只有工业化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提出了非“资”非“社”的现代化方案。力图通过推动国民党政权，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自上而下地来实现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大公报》把国家现代化与拥护国民政府连在一起，又因其不具备领导现代化的政治条件——廉洁有能，因而对它的支持与指责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贯穿于现代化的进程中。

《大公报》作为经济独立的民间报纸，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实现现代化的论说评述，是中国知识分子相对独立的言论机关。它提出的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现代国家应实行专家政治，以及传播现代信息，教授人们扮演现代化角色所做的贡献，在今天看来仍有借鉴价值。



## Abstract

*Da Gong Bao* of 1930's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newspapers in modern China. Most researches on it were about its politics attitudes. My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the historical subject of Chinese people's efforts for the modernization.

During the hard time, China was suffering from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Da Gong Bao* insisted that the only way to save China was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offered a program which was non-capitalist and non-socialist. This program tried to strive for a relatively stable national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 and to realize the economic modernization from top to bottom by pushing Civil government. *Da Gong Bao* connected the national modernization and Civil government together. However, as Guo Min Dang was not qualified as a modern government, which is honest and efficient in official duties, the support and criticism to it has been existing through all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Da Gong Bao* had its own independent foundation as a folk newspaper. It reflected Chinese intellectuals' ideas about modernization. It wa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opinion body for Chinese intellectuals. The opinions that *Da Gong Bao* offered, such as intellectuals should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national political life, modern country should practise expert politics. It also propagated modern information to people and taught people to play modern roles. The work it had done still has useful value nowadays.

### Key words:

*Da Gong Bao*            modernization            economic construction  
political transform    public opinion



# 目 录

## 第一章 绪论 1

- 一、写作的缘起 1
- 二、研究的现状与过去的研究方法 11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16

## 第二章 存亡之际的呐喊 19

- 一、“明耻教战” 21
- 二、《大公报》立场 28
- 三、现代化之路争鸣 39

## 第三章 内聚国力 外御其侮 51

- 一、和平“安内”幻想 55
- 二、哀同室操戈,倡振兴经济 61
- 三、哀鸿遍野中的期待 69

## 第四章 中国出路的探讨 76

- 一、“救亡须自经济自救起” 77

二、“七分经济三分文化”之救国大计	83
三、最后诤谏的努力	94
四、国命垂危,《大公报》立场转变	99
第五章 复兴中国的尝试	106
一、救国根本在政治	107
二、堪任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谋划者	111
三、倡导国家意识	126
第六章 养聪明健全之舆论观	135
一、独立、尊实、建言	136
二、充任“第四权力”	148
三、愿为“一切人之喉舌”	168
四、高声疾呼民生疾苦	179
第七章 为社会实际服务之先锋	189
一、中国现代化的社会雷达	189
二、推动西北开发	203
三、传播信息的使命	219
结 语	230
附录 1:《大公报》30 年代“星期论文”索引	234
附录 2:征引文献	240
附录 3:《大公报》“养聪明健全舆论”的例证	
——抗战初期关于“战时教育”的讨论	244
后 记	267

我们自信,大公报的惟一好处,就是股本小,性质简单。没有干预言论的股东,也不受社外任何势力的支配。因此言论独立,良心泰然。而我们同人都是职业报人,毫无政治上事业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

——《本社同人的声明》

## 第一章 绪 论

### 一、写作的缘起

中国 20 世纪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人民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奋斗的历史。《大公报》作为著名的民间报纸,历经百年沧桑,<sup>①</sup>它是这段历史的记录者、见证者,又是参与者。在这段历史中它发挥了什么作用,后人褒贬不一,随着纪念它百年华诞的到来,对它的争鸣更为凸现,这表现为一方面对《大公报》的溢美之词频繁地出现在国内报刊杂志上,与 50 年前一直遭人诟病、冷落和批判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对《大公报》的批判及否定又原封不动地刊登在不断出版的教科书和报刊史的专著

---

① 1902 年 6 月 17 日创刊,到 2002 年 6 月 17 日是百年纪念日。

中。同时随着大众传播学这门学科的兴起,许多新闻学刊物又多举《大公报》作为传播学中的成功范例。<sup>①</sup> 笔者仅按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的顺序举例,就可以看出世人对《大公报》的评价存在着如此明显的差异与变化。

20 年代,“天津有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sup>②</sup> 《大公报》销数最高到 5 万份,这在当时北方各报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报纸销数不过几千,上万的就不多。<sup>③</sup>

30 年代,《大公报》的发行上升到十几万份,遍及大江南北,风靡一时。原因是南洋华侨一针见血指出了“小骂大帮忙”这个特色。<sup>④</sup>

40 年代,1941 年 5 月 15 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选世界优秀报纸,《大公报》获得荣誉奖章,这是继日本《朝日新闻》后第二家获奖的东方报纸。<sup>⑤</sup>

50 年代,《大公报》“是一张反动的报纸”。“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来掩饰它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服务的实质的。”<sup>⑥</sup>

80 年代,“用‘亦捧亦骂’来描述《大公报》与行政当局的关系,比‘小骂大帮忙’一语更为准确”。<sup>⑦</sup>

90 年代,为《“小骂大帮忙”辩》一文指出,“对《大公报》这样

① 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年 10 版,第 569 页。

郑员铭:《大众传播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开放时代》1996 年第 1 期。

② 徐铸成:《旧闻杂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 6 月版,第 114 页。

③ 《新闻战线》1958 年 1 月号。

④ 曹世瑛:《旧大公报壁还记》,《新闻研究资料》第 3 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年 5 月,第 114 页。

关于“小骂大帮忙”,1945 年 11 月 21 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题为《与大公报论国事》的社论,对此做如下解释:“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立场。”见《文史资料选辑》第 33 册第 97 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 107 页。

⑤ 许焕隆:《中国现代新闻史简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 5 月,第 366 页。

⑥ 德山:《旧大公报剖视》,《新闻战线》1958 年 1 月号,第 25~32 页。

⑦ 谢国明:《“小骂大帮忙”新论》,《新闻学刊》1988 年 1 期。

一份民间报纸,不能以它到底和某个党派在言论上产生了怎样的吻合与不吻合而定其优劣、是非与功过”。<sup>①</sup> 另一种观点仍认为“《大公报》对蒋介石‘小骂大帮忙’,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尤其是在国共两党斗争的问题上竭力为蒋介石及其反动政权鼓吹”。<sup>②</sup>

2000年更有惊人的揭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与蒋介石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有关。这一事实证明了《大公报》与蒋介石的关系。<sup>③</sup>

值得注意的是,当大陆这边不断对《大公报》的政治立场争辩时,台湾的刊物则大大称赞《大公报》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有以下几种说法:

(1)“《大公报》交的是国难运!《大公报》不逢着‘九一八’,哪能交进那一步红运?《大公报》交国难运,而遭遇的当国者是宽仁厚德的国民党。《大公报》由是左右逢源而欣欣向荣。”<sup>④</sup>

(2)从“九一八”到抗战,“一般人认为《大公报》的头条新闻可以代表或暗示蒋委员长的政策,一般人是这样重视的”。<sup>⑤</sup>

(3)《大公报》“由于能把握‘小骂大捧’的四字要诀,不但从未见忤于当道,反蒙当道特达之知”。<sup>⑥</sup>

再看当时对峙的国共当局的想法:“蒋介石从不看《中央日报》,也不看《新华日报》,但每日必读《大公报》。在他的办公室、

① 刘自立:《“小骂大帮忙”辩》,《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8月1日。

② 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稿》,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231页。

③ 阎愈新:《“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发出的一件密嘱》,《光明日报》2000年12月15日。

④ 程沧波:《我所认识的张季鸾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6期第13页。

⑤ 陶希圣:《遨游于公卿之间的张季鸾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6期第20页。

⑥ 沈云龙:《从书生论政谈到报纸的企业经营》,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6期第30页。

公馆和餐厅里各放着一份《大公报》，以备他随时翻阅。”<sup>①</sup>

在延安，1944年6月毛泽东对《大公报》记者孔昭恺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sup>②</sup>可见国共双方当时都对《大公报》青睐。

《大公报》人自己又是如何评价该报呢？

其一，《大公报》是中国“有报纸以来，最善于‘利用’人的报纸。它集合了全国人的智慧、劳力，为它效力”。<sup>③</sup>其二，《大公报》是“文人论政，文章报国”的报纸，“是官僚资本企业，主持者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个人都是大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这一时期的这个报，立场鲜明，始终是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sup>④</sup>其三，“《大公报》自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办起，到抗战爆发，历尽政局之纷纭，实无固定的方针可言。其所标榜的文章报国，只能说是《大公报》负责人的抱负，不能认为是《大公报》的言论方针”。<sup>⑤</sup>其四，“《大公报》的熏陶，它所标榜的‘超然’态度渐渐钻入我的脑海”。<sup>⑥</sup>其五，《大公报》“一无政党奥援，二乏政府支持，倒是反过来时加以抨击，三无任何经济援助，全在于报纸得到人民的拥护，赖以生存发展”。<sup>⑦</sup>

综合上述的评价可以看出有以下几个特点：

- ① 王芝芙：《老报人王芸生——回忆我的父亲》，《文史资料选辑》第33册第97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68页。
- ② 孔昭恺说：“在30年代国民党令各报刊称共产党为‘匪’，而《大公报》没有照办，这件事毛泽东记得很清楚。”《旧大公报坐科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01页。
- ③ 陈纪滢：《我对季鸾先生及大公报的体认》，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6期第17页。
- ④ 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7册第2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4页。
- ⑤ 贺善徽：《大公报的抗日言论》，引自周雨《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1页。
- ⑥ 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2月，第50页。
- ⑦ 唐振常：《大公报百年将至所感》，《文汇报读书周报》2000年7月8日。

(1)多是从政治观点、阶级立场来做的政治鉴定。即通过分析《大公报》与国民党是什么关系,对共产党是什么态度,来确定《大公报》在历史上发生的影响。

(2)不论是在台湾的,还是在大陆的《大公报》人,对自己的评价是超越党派、脱离政治。但在受政治斗争左右的60年代,大陆出版的文史资料,则含有报人对自己的深刻批判,如“是官僚资本企业”,说明报人对自己报纸的评价也受政治斗争的左右。

(3)国共两党的要人蒋介石、毛泽东则都把《大公报》看成一个中性的报纸。蒋介石注意的不是自己的喉舌《中央日报》,而是有舆论倾向的《大公报》。毛泽东也十分敬重《大公报》,曾言“红军找到陕北根据地,也是从《大公报》中读出”。<sup>①</sup>

(4)随着学术上逐渐形成的宽松氛围,人们开始重新评价《大公报》,提出了与几十年前不同的看法,要为“小骂大帮忙”辩,要为《大公报》摘掉反动政治立场的帽子。

非常有意思的是,国民党虽从没有把《大公报》看成是自己的机关报,但极力表示《大公报》是一直跟着政府走的,<sup>②</sup>以此来证明国民党代表了民意。然而历史又留下了难解之谜,该报的三位主笔都没有去成台湾,他们有的在抗战时病逝,有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辞世,有的在香港去世。

总之,《大公报》引起的当事人和后人众多的评说,说明该报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正像报人自己所说“无论毁之誉之,旧《大公报》毕竟是一张影响深远的报纸”。<sup>③</sup>这引起了我对该报的注意,《大公报》到底是一种什么报纸,它在中国历史

---

① 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第161页。

② 杨尔瑛:《季鸾先生的思想与轶事》,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6期第25页。

③ 曹世瑛:《旧大公报壁还记》,《新闻研究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5月,第114页。



上起了什么作用？

进入新的世纪,《大公报》中的政治风云人物都悄然离去,大多数学者开始改变过去以政治标签定性的研究方法,这为重新认识《大公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时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明确地提出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是求得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一历史主题为本人的研究提供了更宽广的思路,可以摆脱“近现代史被革命化、党史化”,“用划分阶级成分和做政治鉴定来代替对思想进程的客观的科学探讨”<sup>①</sup>的思维方法。

报纸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是社会进步的精神食粮。报人胡政之曾说:“以新闻事业之是否发达,而断定其国文野之程度;凡新闻事业发达之国家,其文化程度必高,反之文化程度必低也。”<sup>②</sup>《大公报》是展现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因为报纸的内容就是记载事实、陈列知识、分析社会、发表民意……本文就是通过这一窗口,截取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段(1931年9月18日~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研究《大公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作用。

《大公报》由英敛之创办,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1966年9月10日终刊(大陆版),先后出版64年。《大公报》64年的历史大约分为三个时期,老《大公报》时期(1902年~1925年),新记《大公报》时期(1926年~1949年),新生《大公报》时期(1949年~终刊)。

老《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1866年~1926年),名华,字敛之,满族人,幼年家贫,靠自修读书,22岁时信奉天主教。1902年办报后,于1916年9月将《大公报》转卖给安福系的王郅隆继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4页。

② 胡政之:《中国新闻事业》,《民国丛书》第二编48集,黄天鹏编,据光新书局,1930年版影印,第243页。